

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模式重构、中国机遇和参与路径

邹 军*

【摘 要】 互联网治理模式经历了从个人管理到以“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为核心的“网络化治理”过程。近年来,互联网治理模式面临新的重要变局,由政府、私人部门和公民社会共同组成“多利益攸关方”模式将是未来重构方向,互联网全球共治的时代即将到来。中国将在互联网安全和治理领域面临新的机遇,可通过参与全球互联网管理制度的顶层设计,鼓励企业及社会团体共同参与、大众创新等路径,加入互联网全球治理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 互联网治理;多利益攸关方;全球治理

自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在全球兴起以来,互联网治理一直是全球治理领域的热门话题。“互联网治理”研究涵盖的主题包括: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ICANN)、国家顶级域名机构、域名政策、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WSIS)、互联网治理论坛(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IGF)、IP地址、地区互联网登记、互联网标准、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ETF)。其他类似研究则可分别归入电信政策(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信息安全经济(information security economics)、网络法(cyberlaw)的研究范畴。^①因此,所谓“互联网治理”有其特定的内涵,主要涉及互联网基础架构、协议等关键性资源的界定、分配和操作。这让它与旨在规范网络内容和网络行为的“网络空间治理”相区别,尽管两者常常密不可分。

由于对互联网影响的高度关注,国内研究有重网络空间治理的偏好,如“净网”行动、整治网络“大V”、网络舆情治理、打击网络谣言等,或者将围绕关键资源展开的互联网治理与互联网内容监管混为一谈,模糊了互联网治理真正的焦点。事实上,离开了域名解析、IP地址分配,所谓的网络空间也将不复存在。随着互联网在全球的大规模扩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莫不打上互联网的烙印,互联网关键资源愈发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其争夺也日趋白热化,这构成了互联网治理变迁的最大动力。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全球互联网版图的拓展,一批新兴互联网大国崛起,全球互

*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江苏省地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210097。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手机舆情形成机制及应对研究”(11BXW043)、江苏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热点难点问题研究”(13ZD001)和江苏省“青蓝工程”科技创新团队项目成果。

①M.J. G. van Eeten & M. Mueller, “Where is the governance in Internet governance”, *New media & Society*, vol.15 (5), 2012, pp.720—736.

联网治理模式重构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因而,如何认识这一变迁大势,更好地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打造网络强国,保障网络安全,将是我们身处的网络时代必须直面的重大课题。

一、从个人管理到“网络化治理”的模式变迁

所有计算机网络都需要一定程度的管理,但互联网分布式的属性和它对政治、经济 and 文化的深刻影响决定了其管理方式总是容易引发争议,因而是权力斗争的重要场域。有研究者认为,互联网治理经历了“技术治理模式、网络化治理模式、联合国治理模式和国家中心治理模式的变迁”^①，“自由放任和市场导向的网络空间规则逐步让位于国家主导的管控”^②。但如果细察互联网治理的变迁过程,会发现所谓的“联合国治理模式”大多停留在讨论的层面,“国家中心的治理模式”作为基于网络空间的“再主权化”引申的对网络空间的监管,与互联网治理的主要对象——关键性互联网资源没有太大关系。总体看来,互联网自诞生以来,经历了从个人管理到以“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为核心的“网络化管理”过程,而美国一直是其中唯一的主导国家。

作为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技术成就之一,互联网的雏形——“阿帕网”诞生于“冷战”时期的美国。在其建立之初,能够接入“阿帕网”的仅仅是美国国防部下属或关联的研究机构和人员,而负责管理这一网络的也仅有少数几位相关科研人员。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今看起来似乎无处不在的互联网,在其成立之初,完全是由个人管理的。自上世纪80年代起,随着一系列技术标准的确立,尤其1989年“万维网”的发明,互联网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扩散,这种局面也未得到改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域名系统(DNS)成功地实现商业化和私有化之前,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学者Jon Postel管理的。^③可以说,在互联网大部分发展历史上,网络都处在美国工程师与学者的管理之下。^④

然而,随着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的勃兴和影响力的越来越大,这种“以美国为中心”、一国垄断式的管理方式招致广泛质疑。1998年,一个“互联网中技术、商业、政治派别及学术团体的联合体,其内部存在众多行为体,包括地区互联网地址登记机构、技术联络组、科学研究人员、利益集团代表等”,“全球性的、不以营利为目的、谋求协商一致”^⑤的组织——“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正式成立。此后,有关互联网治理模式的争议和演变,基本上都围绕着ICANN展开。

“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为什么会成为互联网治理的焦点?其原因在于:首先,它是为满足在全球范围内对唯一的互联网名称和数字地址加以协调的需要而设立的。它作为非盈利性的国际组织,通过设立董事会和若干咨询委员会等方式,在形式上实现了网络治理的国际化。其次,作为全球性的协调机构,它是少数几个全球互联网集中控制点之一。第三,它代表了全球治理职能的私有化。第四,这一机构被单一的主权国家美国监管,并对其负责。^⑥美国政府通过互联网数字地址分配局(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简称IANA)合同授权其执行互联网数字地址分配局的技术职能,美国商务部与其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提供了一份期望ICANN执行的政策任务清单,其中的特定优先事项和阶段性目标明确地反映了美国政府的利益。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还与美国最重要的互联网根服务器运营商——威瑞信公司之间签署合约,不仅要求威瑞信执行ICANN的全部决策,还要求

①王明国:《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模式变迁、制度逻辑与重构路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3期。

②蔡翠红:《国家-市场-社会互动中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

③M. Carr, “Power Plays in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3 (2), 2015, pp.640—659.

④刘杨钺:《全球网络治理机制:演变、冲突与前景》,《国际论坛》2012年第1期。

⑤J. Mathiason, *Internet Governance: The New Frontier of Global Institute*,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 70—96.

⑥[美]弥尔顿·L·穆勒:《网络与国家:互联网治理的全球政治学》,周程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2—73页。

其执行美国有关根区文件的指示。因此, ICANN作为一个全球组织, 它的实质是“一个国家政府对于一个私营公司具有直接的、形式上不受限的控制权; 同时, 这个私营公司又被授予了可对全球互联网标识符体系核心产生影响的政府制定权。”^① 尽管这样的模式能确保全球秩序的最高权威, 甚至被认为“比任何已知的选择更好”^②, 但这样的制度安排不仅让网络自由主义者不满, 也成为保守主义者攻击的对象。前者指责其集中管控互联网, 背离互联网自由结盟、自主治理和技术中立原则的早期模式, 后者则主张主权国家应把传统的国家权力延伸至互联网,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将政策的制定权授予美国监管下的私人行动者。

2001年, 联合国大会批准国际电信联盟的提议, 同意在国际电信联盟的领导下, 召开世界信息社会峰会(WSIS)。由于瑞士和突尼斯都想主办第一次峰会, 因此第一次峰会分为两个阶段, 自2002年开始, 于2005年11月结束, 分别被称为“日内瓦峰会”和“突尼斯峰会”。实际上, 人们倡议召开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时, 并没有料到互联网治理会成为优先考虑的议题, 甚至直到2003年2月召开西非地区性会议时, 第一阶段的筹备会议议程中几乎没有任何关于互联网治理的讨论。^③ 但在峰会开始后, 一些发展中国家不满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 也不满互联网治理中非政府政策制定机制的盛行,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的议程发生了转向。到了突尼斯峰会期间, 完全转变为“互联网治理世界峰会”了。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第一次明确讨论了主权国家在互联网治理中的角色问题, 也给予发展中国家和欧洲一次机会, 对ICANN机制展开批评。但总体而言, 峰会并未产生任何实际的影响力。两个阶段产生的《日内瓦原则宣言》《日内瓦行动计划》《突尼斯信息社会议程》和《突尼斯承诺》大部分都是纸上谈兵。峰会没有通过有约束力的条约和公约, 没有废除ICANN机制, 也没有将其置于联合国的管辖之下, 因而所谓“联合国治理”模式并不存在。此次峰会尽管未能就网络治理达成一致, 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在日内瓦会议期间, 谈判各方要求建立一个互联网治理工作小组; 在突尼斯峰会上, 与会的各国政府首脑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召集“一个为多边利益攸关方开展政策性对话的新论坛”, 即“互联网治理论坛(IGF)”^④。此后, 一年一度的互联网治理论坛成为多边主体共同协商, 国际社会利益相关方各抒己见的机制化平台, 一些国家和地区还自发地举办自身的互联网治理论坛。

总之, 自1998年ICANN建立以取代个人管理以来, 互联网治理以ICANN为核心的“网络化治理模式”迄今未有改变。所谓“网络化治理”即治理组织的网络化, 它包括组织与个人的相对松散的联盟关系, 他们依赖有规则的交流互动来实现合作目标。^⑤ ICANN就是这样的网络化组织。2005年7月14日, 联合国公布《互联网治理工作组报告》, 建议设立全球互联网理事会以取代ICANN, 同时加强ICANN政府咨询委员会(主要是来自于美国之外的政府代表)的作用, 但因其“执着于自上而下的等级制治理模式并运用到互联网领域”^⑥没有得到采纳。有研究认为, 全球互联网治理领域的制度建设存在着碎片化趋势, 美国及其坚定盟友、欧盟、发展中国家各有追求。如欧盟既要求进一步摆脱美国对数字与地址分配职能的控制, 又反对任何政府间国际组织对全球互联网治理的主导^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ICANN本身的变革对于互联网治理的方向就变得至关重要。

①② [美] 弥尔顿·L·穆勒:《网络与国家:互联网治理的全球政治学》, 周程等译,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年, 第75、74页。

③ D. Souter, “Whose summit? Whose information society?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civil society at the 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007-05-02, <http://www.apc.org/en/pubs/manuals/governance/all/whose-summit-whose-information-society>, 2015-07-15.

④ 王孔祥:《国际化的互联网治理论坛》,《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3期。

⑤ [美] 弥尔顿·L·穆勒:《网络与国家:互联网治理的全球政治学》, 第7页。

⑥ M. Mueller, J. Mathiasen & H. Klein, “The Internet and Global Governance: Principles and Norms for New Regime”, *Global Governance*, vol. 13(2), 2007, pp.237—254.

⑦ 王明国:《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模式变迁、制度逻辑与重构路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3期。

二、面向全球共治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

进入2015年,互联网治理模式面临新的重要变局,这源于ICANN与美国商务部的协议即将于2015年9月30日到期。早在2014年3月14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放弃对ICANN的控制权,但明确拒绝由联合国或其他政府间组织接管,只同意由ICANN董事会与全球“多利益攸关方”(Multi-Stakeholder)讨论接管问题。2014年10月13日,在洛杉矶举行的ICANN第51次大会上,ICANN董事会主席法迪·切哈德(Fadi Chehadé)也表示,2015年该机构将脱离美国政府的监管。尽管ICANN至今对于脱离美国监管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和具体的移交方案,但毫无疑问的是,“多利益攸关方”模式将是未来互联网治理模式重构的方向。这至少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期间的多边对话中露出端倪。在“突尼斯峰会”期间,互联网治理工作组不仅产生了关于互联网治理的定义,还提出了三大利益攸关体——政府、私人部门和公民社会——以及他们各自的角色。这成为理解“多利益攸关方主义(multi-stakeholderism)”的要义。事实上,在过去的10多年里,“多利益攸关方主义”(multi-stakeholderism)几乎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同义词。“多利益攸关方”模式不仅仅被认为是互联网治理的最好途径,也被认为是提供了更普遍的全球治理的创新模式。^①

人们可以从ICANN的运作中看到多个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影子,但以ICANN为核心的治理模式与未来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相比却有明显不同。首先,ICANN模式只能算是“多利益攸关方”模式的预演,因为美国政府计划阻止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政府参与其中,虽然美国多年来未能兑现其承诺,但政府作为互联网治理中的重要利益攸关方被排除在决策之外,显然不能说ICANN模式是完整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事实上,ICANN受到持续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排除政府介入的制度安排,这也是主权国家、网络保守主义者、现实的政治家们最不能接受的。其次,“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来有效识别围绕这一议题的利益多样化群体。互联网几乎冲击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我们也不能说类似环境污染治理、婚姻法修订之类的议题也与互联网有关。在“多利益攸关体”治理的特殊语境下,真正的利益相关者更容易被发现,因为基于技术和竞争性利益的原因,他们可以更直接地说出自己是怎么被治理和控制的,而不是像通常那样通过多边或超国家模式的政府代表表达自己的诉求。第三,“多利益攸关体”模式可以让不同范围的行动者更紧密地进入到决策过程之中,允许专家意见在最合适的时候得到采纳。那些与技术前沿最近的、能够提供洞察力和愿景的,平时又不能够接近政策制订的组织或国际机构也可以利用这个机制表达意见。这将大大促进互联网治理以必要的灵活性去适应网络生态环境的变化,由此实现创新的最大化和市场的自由开放。最后,“多利益攸关方模式”强调了合作的重要性。不仅政府要面对私人部门的专家意见,私人部门与公民社会也不得不承认随着互联网的扩张而带来的政策议题的复杂性。这与早期将政府排除在治理之外,认为互联网相关事务属于私人部门的自治领域或技术人员的自治社区,仅需要通过自我规制就能得到解决的治理模式大相径庭。^②总之,相较于ICANN的管理,多利益攸关方模式更开放、更完整,也更符合全球治理的历史潮流,呼应了新兴互联网大国参与共治的要求。一旦付诸实施,可以说互联网全球共治的时代真正到来。它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国家间的合作被提上日程。这是互联网作为全球性市场对国家边界构成冲击的必然结果,

^①B. de la Chapelle, *Internet Governance: Infra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256—270.

^②M. Carr, “Power Plays in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是全球多边主义合作基础上的共同治理,它的目的是要建立各种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互联网治理秩序,动员全球范围内的力量,共同参与全球事务的管理。这其中,国家间的合作共治是重要方向。这有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为维护国内网络安全所做的努力。但是,当前的实际情况却是“在推动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进展。”^①“虽然有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对国内的网络空间进行治理,而且也已经发起了进行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的呼吁,然而多数国家对此呼吁的回应并不是非常积极。”^②因此,推动网络空间国家间的合作,任重而道远。

其次,充分体现“去中心化”和“多样化”的属性。正如美国研究者Laura DeNardis所说,这是“多利益攸关方”互联网治理真正的力量所在,她视之为互联网“弹性、稳定性和适应性”的一个主要因素。^③“去中心化”意味着组织权力来源的分散化,各利益攸关方在协商互动中实现决策,最终也不需要某一个权力中心负责。“多样性”则表现为各利益主体自身诉求的多元化及讨论议题的五花八门。随着互联网被采纳的范围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深,网络治理的议题也不断更新,各方的利益格局也会时时调整。如在固定互联网时期,网络服务提供商(ISP)在整个网络生态链中居于强势地位,因为他们提供接入服务;而在移动互联网兴起之后,移动终端制造商如苹果公司则乘势而起,通过应用程序商店和事先植入的程序完全控制了终端设备的功能,包括以什么方式接入网络。网络权力格局的变化改变了“网络中立”论争及立法的方向,^④也对互联网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多利益攸关方模式的“多样化”属性可有效地适应这一变化。

第三,“多利益攸关方”模式并非革命性的变迁,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旧有的权力结构。正如有批评者所指出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并没有改变现有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尤其是,这一模式给了力主建立这一模式的美国政府和与美国政府结盟的利益相关者以特权。“多利益攸关方”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公民社会依旧保持着相对微弱的影响力,尽管它相对于其他部分扮演着重要的维护治理合法性的角色;私人部门被美国的跨国公司控制,他们在许多方面扩张美国的权力;政府并没有表现出放弃对于最终权力的传统控制。^⑤总之,从ICANN到“多利益攸关方”模式的变迁,并不会损害美国在互联网治理领域的控制优势,相反,它延续和强化了这种霸权。然而,在向“多利益攸关方”互联网治理模式过渡的过程中,却给予了中国这样的新兴互联网大国以新的机遇。

三、全球共治下的中国机遇与参与路径

中国作为全球网民数量第一、域名数量第二的网络大国,既需要坚实的网络安全基础,也理应在互联网的全球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囿于此前的机制安排,中国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不能享有应有的话语权。随着“多利益攸关方”模式下全球共治进程的启航,中国面临难得的机遇。

首先,互联网管理权力告别一国垄断,有助于中国维护网络安全,提升国家网络利益。从技术和功能的视角看,ICANN是卓为有效的域名和数字地址管理机构。然而,有一些未曾预料的政治因素导致对ICANN作为政策制定者的身份构成挑战,比如领土和主权的影响。例如,ICANN有权分配国家顶级域名代码。在新兴国家和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背景下,这些顶级域名在划定国家网络空间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主权空间合法化。反之,终止域名解析服务,就意味着一国从互联网世界中消失。如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ICANN终止了伊拉克顶级域名的申请和解析,伊拉克便从互联网的世界里变

①②杨嵘均:《论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面临的难题及其应对策略》,《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③L. DeNardis, *The Global War for Internet Governanc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230.

④邹军:《“网络中立”论争新趋势及启示》,《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6期。

⑤M. Carr, “Power Plays in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得不复存在。此外,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原来IPv4协议下的IP地址中,74%的地址被分配给了美国。有学者指出,这种类似域名和IP地址等关键性资源分布的不平等将全球互联网治理拉回到“威斯特伐利亚框架”(Westphalian framework)。^①未来根域名服务器不会全部置于美国或在美国控制之下,重大决策也将经多利益攸关体协商,这对于秉持“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理念的中国而言,意义不言而喻。而且,中国在全球网络资源分配中的不公平待遇也有了改变的契机。

其次,中国是全球网络攻击的受害者和重灾区,全球共治的成功运行能有效降低网络冲突的风险。在2014年伦敦ICANN大会上,中国代表提出互联网全球共治应该坚持“平等开放、多方参与、安全可信及合作共赢”的原则。从观念上看,全球共治强调超越冷战思维,主张互信互利,尊重多样文明和多样性,谋求共同发展与繁荣;在利益层面上,以建设“自由而开放的互联网”为目标,保障网络安全,促进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繁荣与发展;在制度层面上,强调通过多层次、多领域、多主体的协商和多边合作机制,实现决策权力的“去中心化”,重视磋商、决策、执行和监督。因此,全球共治有助于消除网络霸权,降低网络冲突的风险,这都是中国在互联网领域长久以来的重大关切。

第三,全球共治会引发网络空间治理的全球性合作,从而集合各方力量应对一国不能解决的网络问题,中国提出的“网络共享,空间共治”的主张有望实现。对互联网关键资源的全球共治必然会引发网络空间治理全球合作的推进。没有一个国家的互联网,而是全世界共享的互联网。网络空间治理的难度更大,因为互联网行为具有全球性,行为人足不出户,行为结果却可以到达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管辖冲突或无法管辖的情况时常出现。随着全球共治的推进,互联网空间的全球共同治理也必然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对于那些单独一国束手无策的问题未来可能会以较低的成本得到妥善管理和解决。这既维护了单一国家的网络安全,也有利于共同应对全球网络安全威胁。这也是中国政府多年追求的目标。

总之,“多利益攸关体”互联网治理模式虽然不会尽善尽美,但对于中国而言,机遇和利好是首要的。要抓住这些机遇,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参与全球互联网管理制度的顶层设计。中国拥有6.88亿网民、5亿微博用户、5.5亿微信用户,每天信息发送量超过200亿条;拥有400万家网站,电子商务年交易额超过1万亿英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②互联网及网络安全之于中国的意义无需赘述。由于第一代互联网完全由美国主导,不仅其总体架构和技术标准均以美国为中心设计,管理制度设计也打上了深刻的美国印记。中国需要参与互联网秩序的重构过程,从域名和互联网协议地址管理、根服务器系统管理、技术标准采纳、对等和互联设计、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及打击网络犯罪等方面发出中国声音,并且“要积极参与国际立法,运用国际法打击网络犯罪行为,维护我国国家主权”^③,体现中国意志。其次,参与“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管理权的博弈,赢得更多话语权。ICANN的管理权会移交给“全球利益攸关体”,在此过程中,多利益主体的博弈是必经的过程。中国应当主动参与到这一重要机构重组的权力博弈中,在互联网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有业界人士指出,中国若能参与域名根数据库管理,将大大提高中国在互联网领域的话语权,给中国的域名服务带来更多的安全感,中国用户也将可以享受更快的域名解析速度和更稳定的解析服务。^④第三,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参与全球治理。从全球范围来看,互联网管理权力的博弈主角是私人部门和公民团体,政府隐身其后。“多利益攸关体”中的私人部门大多与美国利益密切相联,公民社会团体也呈现精

^①Y. Zhao, “China’s Pursuits of Indigenous Innovation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s: Hopes, Follies and Uncertaintie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3, 2011, pp.266—289.

^②东方晓:《互联网全球共治的新机遇》,2014年6月24日, 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6/24/c_1111288163.htm, 2015年7月12日。

^③杨嵘均:《论网络空间草根民主与权力监督和政策制定的互逆作用及其治理》,《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3期。

^④于杰:《美国放弃ICANN管理权 互联网全球共治时代到来》,《中国计算机报》2014年3月24日。

英化的趋势,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如百度、阿里、腾讯、华为以及中国的各类社会团体都难有其位。中国需要支持和培育多层次的社会化力量,积极参与到国际互联网治理的博弈中去。尤其是在一些保障网络安全的技术设施建设上更需要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介入。如在中国境内架设服务器解析全球域名的的工作关乎网络安全利益,但根服务器的部署和运行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和可行性研究,引导企业和社会机构积极参与势在必行。最后,鼓励大众创新,引领网络发展。美国之所以拥有全球互联网的独家控制权,很大程度上与它拥有最领先的技术和应用有关。未来全球互联网争夺焦点是网络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具体应用。要在争夺中取得有利位置,必须重视大众参与,“尤其是对于网络这样的新技术来说,科技创新需要发挥大众丰富的想象”^①,以创新的业态引领互联网的发展方向,取得网络发展和治理的主导权,从根本上摆脱亦步亦趋的模式依赖,在更高层面上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

四、结语

本文着重讨论了针对互联网关键资源的互联网治理的模式变迁历程和目前重构的方向——“多利益攸关体”治理模式。与通常认为ICANN治理也可称为“多利益攸关体”模式的认识不同,本文认为这虽非全新的治理模式,但就互联网治理而言,却是一个模式重构的过程。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主权国家政府力量的介入。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一方面美国明确拒绝将ICANN移交给任何联合国或其他政府间组织,另一方面政府又是“多利益攸关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美国将政府排除在外的主张既有此前一系列制度安排的铺垫,也因其文化和语言上的软实力以及长期形成的意识形态霸权。这并非单纯的支配,不是基于数量优势的强制力和物质资源,而是一种基于一致关系的社会权力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机会,恰恰相反,全球共治时代的开启,给了中国难得的机遇。循着可能的路径,中国可加入互联网全球治理的历史进程,造福人类,并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

(责任编辑:杨嵘均)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Mode Reconstruction, China's Opportunities and Participation

ZOU Jun

Abstract: The mode of Internet governance has changed from personal management to the Networked governance based on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since the birth of Internet. In recent years, Internet governance has undergone an important new change: a “multi-stakeholder” mode is taking shape, which will be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Internet governance. This new type of governance involves the government, the private sector and civil society, which means the era of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is coming. In light of this, China will face new opportunities in the field of Internet security and Internet governance, and it should engage in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by such approaches as participating in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global Internet management system as well as encouraging enterprises and civil society's participation and mass innovation.

Key words: Internet governance; multi-stakeholder; global governance

^①林德宏:《想象与科技创新》,《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